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影响历史进程的遗嘱

在“贞观之治”背后——唐太宗《帝范》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王朝更迭的历史中，择立太子一向是件关乎整个朝局的政治大事，许多有作为的皇帝都曾为此大伤脑筋，寝食难安。唐太宗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他晚年在立储问题上可谓费尽心机，并陷入了无尽的烦恼之中。

一、册立太子风波

唐太宗一生共有子 14 人，其中长孙皇后所生的有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和九子李治。按照传统的皇位继承以嫡以长的原则，嫡长子李承乾无疑应立为储君，将来的皇位由他来继承。唐太宗自然也不愿违背这种制度，因为它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保证皇室血统的一脉相承，二是可以避免皇帝诸子之间的互相争夺。所以，他从高祖李渊手中接管政权之后，于武德九年（626）十月诏立嫡长子承乾为太子，当时承乾年仅 8 岁。

幼年的承乾冰雪聪明，深得太宗的喜爱，先后聘请李纲、于志宁、李百药、杜正伦等名师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教之，刻意加以培养。承乾也颇能领会皇父太宗之殷切期望，虚心接受师教，对老师莫不“耸然礼敬”。稍长，太宗开始让他学习处理朝政，“庶政皆令听断”。承乾在处理政事时“颇识大体”，后来太宗离开京师出巡的时候，“常令居守监国”，这说明太宗对他是相当信任的，大臣们对他代父处理政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才干也是比较满意的。

然而，作为太子，承乾长期生活于深宫之中，缺少太宗那样接触民间、目睹动乱的社会阅历，对“百姓艰难”了无所知。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身上的骄逸之气渐渐地表露出来，喜好声色，漫游无度，骄奢之极，政治上也开始偏离法度，甚至还制造假象愚弄贤良。每临朝，虽口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押。由于他机灵滑头，善于文过饰非，竟瞒过了许多朝臣的耳目，但这一切都没有躲过太宗的眼睛。太宗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培养承乾成为理想继承人的期望。他决定为太子另觅名师指点，匡正过失。他找到了以直言进谏闻名朝野的杜正伦，要他协助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共同指导太子。太宗对他们寄予厚望，还特意指出：“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希望借助他们的犯颜直谏，纠正太子的过失，改掉“饰非”的习性和纨袴邪气，可谓用心良苦。

恰在这时，承乾脚上患病，不能朝谒，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之机，于是一班恶少乘虚而入，引诱他走上“侈纵日甚”的浪荡邪道。即使有于志宁、杜正伦的犯颜规劝也很难使他回心转意。杜正伦想不负君望，着力纠正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屡次开导直谏都没有明显奏效，只得向太宗照实说了。太宗指示道：“儿子生疾病，是可以理解的。但一点也没好名声，私下常与不三不四之人结交，你可去察访一下，并予以规劝，若不改，一定来禀告我。”太宗认为太子的君德缺陷比之生理缺陷更为严重，但太子的病足反过来也加深了太宗的恶感。

就在太子承乾失德日见显露的过程中，太宗对魏王李泰的宠爱却与日俱增。李泰聪敏绝伦，文辞美丽，又相貌英俊潇洒，且能礼接士大夫，使太宗不由得刮目相看，宠异有加。李泰手下的文士心领神会，开始密谋夺嫡之计，特派杜楚客一类人去与朝廷大臣相交，甚至送财物去贿赂，并相机暗示说李泰聪明，“可为嫡嗣”，此时，大宗已初步“有废立之意”，所以他听到这

种事，也就“ 隐而不言 ”，用听之任之的态度放纵与支持李泰的行动。假如没有废承乾立李泰的意向，太宗是决不可能容忍李泰这种行为的。不少朝臣也从中看出了一些苗头。可是，换宗易嗣毕竟是件大事，太子非有重大过失，是不能任意废黜的，太宗自己由夺嫡而登皇位，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也许正因为如此，太宗并没有明确表过态，有所犹豫。太宗的举棋不定引起了朝廷的分裂，在承乾失宠，魏王李泰得幸的情况下，二人“ 各树朋党 ”，形成了敌对的营垒。一方千方百计地夺嫡，一方则因失宠而铤而走险，加快了密谋政变的步伐。

太宗对李泰的偏爱越来越明显，甚至暗示李泰将为君主。这一切引起了承乾及其党羽的恐慌，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为了保住嫡长子地位，维护太子的皇位继承权，他们密商应对之策，制订了暗杀与政变两套计划。先是派出刺客纥干承基谋害李泰，企图除去储君的争夺对手，保持太子的地位。后因此计没有成功，只得退而求其次，作出冒险的抉择，发动宫廷政变，胁迫太宗放弃废立太子的决定或逼其退位。然而事与愿违，承乾及其党羽的政变计划很快败露，承乾被废为庶人，汉王李元昌被赐自尽，参与策划宫廷政变的侯君集、李安俨、赵节及杜荷等人被处斩，一场酝酿之中的政变还没有动手就被扑灭了。

照理说，太子既废，太宗又对李泰恩宠日隆，常常逾乎礼制规定，储君这个位置理所当然是李泰的了。但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其中曲折还有不少。

太宗确实也面许李泰为太子，并曾对侍臣说：“ 昨青雀自投我怀，云‘ 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 ’。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其怜之。 ”“ 青雀 ”是魏王泰的小名，晋王即太宗九子李治。李泰的话自然是一种戏剧性的表演，但也隐约地说明了太宗究竟择立谁为储君依然兴棋不定，否则李泰没有必要在太宗面前矫情作态。而此时太宗所以犹豫不决，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皇族子孙的安全考虑。他对唐初“ 玄武门之变 ”这幕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惨剧记忆犹新，深知自己如果在立储问题上稍有不慎，极有可能重蹈宫门喋血的悲剧，不利皇族子孙的和睦。唐太宗经过冷静的深思，感到立李泰有许多问题，可以说是阻力重重。

元老重臣是普遍反对立李泰为太子的。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与褚遂良等人过去都主张保留承乾的太子地位，不赞成改立魏王李泰，现在自然也不会支持李泰为储君。当岑文本、刘洎、崔仁师等人纷纷密奏请太宗立李泰为太子时，长孙无忌便首先极力反对，褚遂良也毫不掩饰地对李泰的许诺提出质疑。他说：“ 陛下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执政为天下之主，而能杀其爱子，传国于晋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而复宠爱魏王，礼数或有逾于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鉴不远，足为龟镜。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 ”以太宗的政治经验，本来不难识破李泰许诺的虚伪与欺骗性，只是不愿戮破而已。褚遂良则顾不了这些，一下子把太宗心中的矛盾揭示出来，使他再也无法回避。他权衡利弊，强抑自己的心理矛盾，涕泗交流地说：“ 我不能。 ”

实际上，择立李泰还是李治，不仅关系他俩的生死，也直接关系到承乾将来的命运。特别是承乾被废时的一番自我辩解让他深感不安，不能不三思而后行。承乾的政变计划流产之后，太宗曾面加谴责，承乾说：“ 我贵为太子，还有什么要追求的呢？主要是因为李泰要谋我这地位，才与朝臣谋自安

之道，而致使别有用心之人教唆我做不轨之事。现在若以李泰为太子，那不正中他下怀吗？”这段话既合情合理，又意味深长，自然会引起太宗的深思。太宗最初动念立李治为太子，可能就是这句话引发出来的。从感情上说，他一贯属意李泰；从理智上说，他不能不择立李治。出于对皇族内部的和睦与安全的深切忧虑，也出于玄武门骨肉相残的惨痛记忆，太宗最后干脆一并舍弃了承乾和李泰，而改立九子李治为太子。定策之后，太宗立即向朝臣表示：“我若立李泰，那么，承乾、晋王皆不免一死；但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则泰与承乾可无恙也。”

这是他经过长期考虑与权衡的最终结果，太宗的这几句话把所以弃泰而立治的道理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虽然他择立李治为太子实在是不得已，但却对日后政局稳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至少是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纷争和混乱。司马光曾就此发表议论说：“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九子李治被立为太子，是太宗再三权衡的产物。其实太宗本人对李治的“仁弱”，以及缺乏像自己的英武果断作风，很不满意。所以，太宗弃泰立治之后思想上仍有反复，曾一度暗中向长孙无忌提出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太宗看中李恪，是因为他有文武之才，且有英武果断作风。这个想法，不用说遭到了长孙无忌的抵制，说李治本性仁厚，正是守成的良主，希望太宗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不要再举棋不定。如此，太宗只好作罢。

二、《帝范》一份政治遗嘱

太子废立风波过去之后，太宗委实松了一口气，但如何使仁弱的李治成为理想的继位者，以保证贞观时期所推行政策的延续，又成为摆在太宗面前的急迫任务。在这一方面，太宗确实是煞费苦心，他选用了一批元老重臣，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辅佐”班子，史称“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如太子太师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房玄龄、太子太保萧瑀、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李勣、太子宾客褚遂良等等。太宗深知李治庸懦，非有“良佐”，不足以成大事，所以精心为太子挑选师傅、“良佐”，以化成其德，成就王业。除此之外，太宗还亲自教诲李治。这种规导多半与为君之道有关，有时采取经义结合民间具体利病的方式，有时则抓住日常衣食住行等等生活琐事，但无论哪一种规导方式，都浸透着深刻的为君治国的哲理，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太宗个人的政治经验和为君之道。

太宗晚年对太子李治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希望他尽快成长起来，以便肩负起社稷重任，但太宗对李治并不放心。因为不放心，所以更强化对李治的教育。就在临去世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648）春，太宗还亲撰《帝范》一书，当作皇帝的政治教科书赐给李治，希望他认真研读，以为日后即位遵循、效法。书中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及《崇文》共 12 篇，这既是他一生统治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他留给储君李治的政治遗嘱。他在《帝范后序》中说：“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并告诫李治必须居安思危、小心谨慎、善始善终。他对太子说：“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就是说，他已把自身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完整地总结出来，留给太子李治作为“修身治国”的教科书，使自己开创的“贞观之治”得以延续下去，不至于中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那么，《帝范》中，唐太宗除了告诫太子李治善始善终之外，究竟总结了哪些经验？或者说他究竟为李治提供哪些有关治国之道的理论？《帝范》因是太宗统治生涯的全面总结，所以涉及面是非常广泛的。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大致可以概括为“君道”二字。《帝范》开篇就集中地讨论为君之道的理论，而且，其他各篇也都是围绕着“君道”这一中心思想而展开的，即“君道”在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宋史学家范祖禹特别称赞“太宗可谓知君道矣”，是有道理的。

太宗所说的“君道”，自然并不是他所独创，而是来自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儒家“仁政”、“仁义”思想及政治原则。太宗一生非常尊崇儒家，重视儒家，即位之初就曾说过：“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在儒、释、道三家之中，太宗选择了儒家，而且把儒家当作不能须臾以离的东西。对于佞佛的梁武帝和崇道的梁元帝，他皆报之以无情的嘲讽。对于法家，太宗同样认为不足取，他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有一次太宗问王珪：“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王珪回答说：“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以为然，但他并不是要取消刑罚，也不是要鄙薄法律，太宗本身非常讲求法律，但他把儒学置于首位，认为刑法毕竟是第二位的东西。正是在这种以儒御法、法服从“仁政”的思想指导下，才出现了“贞观之治”下的宽缓刑罚。魏徵一生谏皇帝200 余事，涉及的方面和问题很多，但太宗却把它归结到一点上，说魏徵是“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即使评论古人时，太宗也主要是以“仁义”作为衡量的尺度，他特别肯定晋武帝“仁以御物，宽而得众”，“有帝王之量焉”，他所谓“抚九族以仁”，也就是把儒家的“仁政”理想推而广之，动用到少数民族地区。太宗以前，国学中“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与享”，为了提高孔圣人的地位，他下令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并且还封孔子裔孙孔德纶为“褒圣侯”，以示崇孔。唐太宗规定：“国胄”要以古代儒家的著作为教材，而且以左丘明、马融、郑玄、杜预等21 名唐以前儒学大家配享孔子庙堂。太宗的崇儒重道于此可见一斑。

与历史的许多皇帝不同，太宗不仅在言论上崇儒重道，高擎儒家的“仁政”理想，而且把这种“仁政”理想实实在在地贯彻到具体的实践中去，也就是把儒家的“仁政”理想与具体的政治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不但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道。正因为如此，太宗的政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就了“贞观之治”，并因为此，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明君王。

例如，隋唐之际，经过十余年的社会大动荡，经济一片萧条，出现了“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景象。到了太宗“践祚之始”，仍然是“霜旱为灾，粟价腾起，突厥侵抄，州县骚然”。如何医治战乱留下的创伤，使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是摆在太宗面前的严峻而艰巨的任务。太宗认真总结历代帝王的治败原因，大力推行轻摇薄赋、疏缓刑法的政策，在政治上知人善任，坚持法制，虚怀纳谏，以史为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社会经济得到复苏与进一步发展。史称太宗统治时期“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

国无饥馑之灾”，是个少见的升平时代。从唐初的凋敝到贞观年间的升平，这种巨大的转变，无疑证明了太宗是个兼备理论、才能和效果的全面人物。他发展了自古以来的政治理论，并把这种政治理论推向实践，付诸实施，然后又以自己的理论和治绩撰成《帝范》，垂范于将来，使他成为历代统治者心目中的模范皇帝。

又如，太宗一生武功与文治兼隆，他“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史称“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所称，一人而已”。在他的一生中，前半期风餐露宿，戎马倥偬，在艰苦备尝的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武功；登极之后，又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创造了“振古而来，未之有也”的文治。惟其如此，后人一直把他作为一位理想君主与模范皇帝来推重与景仰。唐朝人吴兢说，他编纂《贞观政要》的目的就是“庶乎有国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意思是说，唐太宗可以代替儒家一贯推崇的理想君主，成为后代有国有家者的楷模。

但是，“贞观之治”并没有尽善尽美，还存在着不少弊政，尤其是贞观后期更多。早在贞观十三年（639）五月，魏徵就上疏太宗，指出太宗善始而不能克终者有 10 条之多。具体表现为贪求珍宝、轻用人才、不愿纳谏、亲近小人、好尚奇异、疏远人才、沉溺田猎、待下严刻、荒怠政事、劳民伤财等。除了这 10 条之外，太宗还善于粉饰自己，口头上巧辞令色，行动上却是另一回事。魏徵临死前上疏批评太宗“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意有何益！”所有这些，在太宗晚年都曾非常明显地存在着，并影响及于整个朝政与社会。好在太宗毕竟是个英明帝王，对于自己的缺点与过失，他都没有隐瞒，在遗嘱中他向太子李治作了无情的自我解剖：

“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徵，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太宗临终之前没有片面地陶醉在成功之中，而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尽美尽善”的完人，只是一个功大于过、益多于损的君主，告诫李治不要以他的“深过”为是而效法之。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即使在古代中国皇帝群体中也是十分难得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太宗存在着那么多的缺点与过失，终究是一种遗憾。这是“贞观之治”不同于“三代之治”，太宗不同于尧、舜、禹的地方。

或许对太宗及“贞观之治”不应如此苛求，因为太宗毕竟是历史上少有的“仁政”倡导者与践履者，“贞观之治”毕竟是历史上艳称的治世之极，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苛求”并不等于否定，事实上，太宗在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地位，以及“贞观之治”对后代政治的规导作用，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太宗临死前留给李治的《帝范》所阐发的为君之道的理论，以及具体的政策措施，也极富积极意义，后代有作为的皇帝无不从中汲取合理的因素，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行为。尤其是其中以“仁政”、“仁义”思想为核心的君道理论，不仅寄托千百万庶民的理想，而且

成为后代有作为的皇帝效法的楷模。就此而言，《帝范》不仅是太宗写给李治的政治教科书，也可视作后代所有皇帝的政治教科书。

三、最后的嘱咐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溘然长逝。弥留之际曾特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至含风殿，嘱咐他们：“朕今悉以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其实，早在一年之前，太宗就把自己所说的一切都写在《帝范》里，并颁赐给李治。其根本的用意在于使“仁政”理想得到继续与弘扬，而弘扬“仁政”的目的则在于“永保社稷”，国祚绵延不绝。

太子李治即位之后，立即宣布“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辅佐之下，继续推行贞观晚年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以及“贞观之治”所体现的“仁政”原则。永徽初年，股肱大臣政见一致，政局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推行以诗赋取士的政策，扩大进士科的人选；颁布《唐律疏议》，完善了贞观法制；平定西突厥的判乱，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这一切都说明了李治在继承“贞观之治”的已有成果的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成果，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还是在社会、法律及军事方面的成果，都比贞观时期有所拓展，所以后世史家称之为“水徽之治”，或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如唐睿宗景云年间，一位名叫韩琬的官员即上疏对此有所描绘：

“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窳，史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轻而不犯，赏虽薄而不劝；位尊不倔，家富不奢；学校不励而勤，道佛不惩而戒。”

这虽然有些夸大和溢美的地方，但大体上还是符合史实的。“永徽之治”与“贞观之治”相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李治及其“良佐”保持贞观政策稳定性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无疑又说明了《帝范》这份政治遗嘱的现实影响。事实上，李治基本上是按照《帝范》所提出的要求去做的，在他统治 30 余年的时间里，承太宗之勋业，把“贞观之治”继续推向前进，成为有道的守成之君，没有辜负太宗的遗愿与嘱托。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李治也奠定了自己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恩怨造成的痛史——高拱《病榻遗言》

高拱曾任明穆宗隆庆朝的内阁首辅兼史部尚书，权倾一时，炙手可热，左右着朝廷内外大事。明隆庆六年（1572）五月中，穆宗暴卒后，他与张居正及太监冯保同受顾命，辅助年仅 10 岁的明神宗朱翊钧，不久在内阁与司礼监，亦即高拱与冯保的争斗中惨遭失败，以“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等罪名被遣送回原籍闲住，不许在京城稍作停留。

太突然了！高拱事先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就在应召去会极门的路上，他还满以为这是他面奏神宗驱逐冯保的大好机会！他怎么能想到神宗召集大臣到会极门竟会是为了驱逐自己！更没有想到宣读这道残酷谕旨的竟是他的政敌冯保！

真不知道高拱在这一瞬间是怎么度过的，他又是怎么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的。一个人从权力的巅峰一下子滑向命运的低谷，这种滋味，也许是置身其外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更惨的，还在后头！

按惯例，明朝大臣解职的时候，有给驿的故事。所谓“给驿”，就是在驿站里支使车马人夫，由国家供给。这是特许，但后来慢慢地成为了常例。可是，高拱被黜，限定立刻回原籍，不许逗留，驿站的马车不派了，他只得自己雇车，有的说是乘牛车出京，有的说是骡车，还有押行的兵役在后面一路追逐，“道路之人见之，多流涕者”。这种遭遇，对于高拱来说，不啻是一种奇耻大辱！

他的回籍，好比是一匹负伤的猛兽，回到草莽中呻吟，他的恼火与愤懑都是可想而知的。据说，高拱回到河南新郑老家后，一直闷闷不乐，晚年多病，颓唐。明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曾谈到高拱临殁前的情形，其中说：“新郑（引者按：代指高拱）作相，可谓赤心为国。其殁也，疾书‘扯淡’数字，投笔便瞑。大根器人到头自脱。今世之人，处非高公之据，腔无救时之血，而没没不知淡者，其性灵何在乎？”不管是他对自己悲剧命运的无奈，还是他已看穿了政治本质之后的一种厌恶之情，“疾书”‘扯淡’数字，投笔便瞑”这几个字确实耐人寻味。无疑，他临殁的情形与他的政治厄运是密切相关的。

一、《病榻遗言》与抱憾终生

在度过了长达七年的痛苦岁月之后，高拱终于在明历六年（1578）十月间病死了。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政治给了他巨大的权力，也给了他同样巨大的耻辱，但他始终无法忘情于政治。有资料说，他被遣送回原籍后，还曾暗中与内监李伟结纳，希望李伟向皇室婉转陈辞，说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状属于“莫须有”，全系张居正和冯保两人所构陷。只不过，当时李伟自身难保，高拱这一愿望因此无法实现。他对隆庆六年那一次惨败一直耿耿于怀，无法忘却。那惨痛的一幕如影子般缠绕着他的晚年，即使是缠绵病榻之际也是如此。他被伤得太深，所以他的恨也愈切。他把这种近乎咬牙切齿的恨非常自然地发泄到了他的政敌张居正和冯保身上，指责张居正与冯保联手陷害他，使他落到这步田地。于是，他在临死之前写下了洋洋两万余字的《病榻遗言》。在这个遗言中，高拱就回忆所及，历数了张居正和冯保的罪恶。同时为自己洗刷罪名，主要有两个核心问题：

（一）高拱说，他在隆庆皇帝驾崩以前就已看出了冯保的不端举动，并决意把他驱逐。冯保一贯狡黠阴狠，“敢为恶而不顾也。”但最不能忍受的是，当明隆庆六年（1572）皇太子接见百官时，他竟利用扶持之便，站在御座旁边不肯走开。百官向皇太子叩头行礼，也就等于向阉人冯保叩头行礼。这种无礼举动，无疑是“欺上幼冲”，亦足见其野心。高拱接着说，当他摈弃冯保的行动尚未具体化之前，冯保抢先下了毒手，和张居正合谋，骗得了皇太后的懿旨，把自己逐出朝廷。他承认，他当时确曾说过“十岁的太子，怎么治天下啊！”但并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而只是说新皇帝年轻，怕为宦官所误，有如正德皇帝 14 岁登极后的情况一样。张、冯二人却把他的话故意歪曲，以此作为诬陷他的根据。

（二）即所谓王大臣案件。万历登极、高拱被逐之后半年，即 1573 年 2 月 20 日，当日清晨有个乔装宦官在宫门前为卫士拘禁。经讯问，此人供称名王大臣，以前在别人家充当仆役，现在没有雇主。这种闲杂分子在禁卫森严的宫门口出现而被拘留询问，过去也曾发生过不止一次，但这个王大臣究竟目的何在，则始终没有弄清楚。高拱在《病榻遗言》中坚定地认为，王大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自总兵戚继光的麾下。戚继光当时正在张居正的提拔之下飞黄腾达，要是这个莫名其妙的王大臣果真如高拱所说，岂不招来极大的麻烦？经过一番精密的谋划，冯保等人定下了反守为攻之计，决定借用王大臣作为置高拱于死地的工具。于是，冯保就将两把精致的短剑放在王大臣衣服内，要他供认他来此系高拱派遣，前来谋害当今皇帝。如果王大臣的口供得以成立，他可以无罪并得到一大笔报酬。张居正则运动鞫讯此案的文官，要他们迅速结案，以便处死高拱灭口。但冯、张的计谋没有得逞，负责审讯的文官不愿参与此项阴谋。王大臣也觉悟到如果供认谋刺皇帝，下场决不可能美妙到无罪而且领赏，于是在东厂主持的初步审讯中翻供，暴露了冯保的教唆和陷害。这时冯保大窘，于是便在酒中下毒，逼令王大臣喝下，以破坏其声带。两天后公开鞫问，由于犯人已经不能言语，无法查出真正的结果。王大臣仍然被判处死刑，立即处决，以免牵累此项阴谋的参与者。

最后，高拱假借别人之口大骂张居正：“毒哉居正！高老平日何等厚你，乃与冯保同谋娇诏倾陷，夺其位；既夺其位，而又中以奇祸，遂欲族诛以灭口，自古险邪忍狠未有如此者也。”“奸哉居正！既借冯保以杀人，而又卖冯保以自饰，使有日事发，又必将推与冯保，而仍自下手，以明其不然也。试待看之，必有信然者矣！”

在《病榻遗言》中，高拱把自己被黜的原因全部归结到张居正、冯保的构陷上，因为对冯、张恨之入骨。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被黜表示无悔，他说：“吾何悔？使我当时为和解取容，今为所卖，则悔也。然我彼时为先皇病笃，恐苦先皇心，故宁受吞噬，而不敢以此戚先皇也。今吾顺以医先皇终，而曾未敢苦其心，则吾本心已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悔之有？”这当然不是由衷之言。也许他对自己被黜之前所做的一切确实并不怨悔，但是如果他的所作所为真如其所说，仅仅是为了穆宗，那蒙受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何至于到临终之际犹火冒三丈！

实事求是地说，在明代的内阁大臣中，高拱绝对是个不坏的首辅，他没有读职，更没有尸位素餐，而是个具有极强办事能力且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可以称得上“临事克慎，如恐弗胜”。据说，他在兼任吏部尚书期间，上午到内阁，下午到吏部，没有一件积案，向以强干著称。但他为相比较专断，对政敌不能宽容，有仇必报，对同僚则不免气势高傲，这使他树敌过多。不过，他的被黜，决不是他的应得之罪。从高拱的角度说，把自己的被黜归结于张居正与冯保的构陷上，并从而把所有的愤怒与怨恨都倾泻到张、冯二人头上，自有其道理。因为他与张、冯之间确实存在着很深的个人恩怨，他们一直是政治上的对手，这是一个久已公开的秘密。

但是，要说清楚他们之间那种至死都化解不开的恩恩怨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之间的恩怨可谓由来已久，而且极为微妙、复杂。

二、官场似战场

追本溯源，若要较清楚弄明高拱与张居正及冯宝之间的关系，那还得从明穆宗一朝的内阁混斗说起。

明穆宗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君主，他爱女人，爱喝酒，爱和内监们一起游玩，爱鳌山，爱宫苑，爱秋千，爱龙凤舰，爱金匿石盆，凡是一切消闲的娱乐他都爱，惟独对实际的政治缺乏兴趣，对他来说，君主的威权实在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朝会的时候，大臣们只管争辩，他照例不发一言，他厌倦这种场合，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说话的必要。如此年复一年，大臣们感到不对劲，

他们弄不清皇上为什么不发一言，纷纷上疏规谏。一位大臣在上疏中直截了当地指责穆宗即位几年来，从来也没有“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并进而认为这样就会导致君臣不相通，朝野相隔离，严重影响国家大事的处理。类似的进谏还有多次，但是一切的规谏，对穆宗都没发生任何实际的影响。或许他压根就不看，他厌倦这些奏章，也没有阅读这些奏章的兴趣、耐心和习惯。这一点，与他的父亲明世宗颇为不同，世宗是个干炼的君主，尽管他喜欢玩乐，崇信道教，从事斋醮，痴心地追求长生不老，但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是君主。虽然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一群有名的首辅，都曾经在嘉靖朝程度不同地执掌过政权，但威权却始终控制在世宗自己的手中。穆宗则不然，他把实际的政治连同驾驭大臣的威柄都一齐放手交给内阁诸臣去处理。他有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样一些干炼的政治家，也有李春芳、陈以勤、郭朴这样一些忠谠的大臣，真是他的福气，因为有了他们，自己再也用不着为一切实际的政治操心了。不用操心琐碎而繁重的实际政治，自然是穆宗梦寐以求的大好事。但是，这样一来，内阁诸臣的权力无形之中被放大了，此其一；其二内阁诸臣的矛盾因失却皇上威权的调控而日趋尖锐。现代著名的传记作家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曾十分精辟地指出：“穆宗一朝，内阁里面只见到不断的混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在穆宗身上。要不是他的放任，是不会出现这种局面的，至少不会出现如此频繁如此激烈的混斗。

内阁中的混斗，主要表现为倏忽来去的一次次阁潮，在阁潮的背后，则是诸臣之间的明争暗斗。

穆宗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有 4 人，他们是徐阶、李春芳、郭朴和高拱。其中以徐阶的资历和威望最高，是首辅。不久，张居正和陈以勤同时入阁，这样内阁大臣内原来的 4 人增为 6 人。6 位阁臣中，高拱与郭朴是同乡，李春芳、陈以勤则是忠厚长者，好好先生，所以穆宗初年的内阁名为 6 人，实则为徐阶、高拱和张居正三位名臣的内阁。三人中，张居正与高拱有相当的关系，与徐阶的关系尤为密切，他的这次入阁，就是凭借徐阶的力量。他有抱负，且迷恋政权，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刚入阁，还没有到出露头角的时候，因此内阁中的混斗主要在徐阶与高拱二者之间展开，并很快酿成一次严重的阁潮。

事情的始末经过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疏弹劾高拱，高咬定胡氏上疏弹劾是徐阶主使，因为他们二人是同乡。高拱是个有仇必报的人，不能容忍言官对他的放肆攻击，主张将胡应嘉革职为民，结果却得罪了言官们。明代的言官是非常厉害的，他们犹如是一窝胡蜂，你动了一个，他们会来一群。都察院有的是御史，六科里有的是给事中。高拱主张将胡革职为民，惊动了“胡蜂窝”，他们纷纷上书严劾高拱。有的说他“奸险横恶，无异蔡京”，有的则说他“无宰辅器”，有的甚至干脆劾他“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面对来势汹汹的言官，高拱自然十分恼火，希望徐阶拟旨给言官们一次廷杖，一则压一压言官们的气焰，二则为自己出一口恶气。但徐阶不愿与言官们结怨，一边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以此结束了事。高拱对此异常不满，二人因此结怨。他心想你徐阶手下有言官，我也有一两个，于是便唆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没料到结果却犯了言官们的众怒，从此成为众矢之的。最后，高拱与他的同乡郭朴二人不得不离开内阁，徐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高拱因此对徐阶更加恨之入骨。

在这一次严重的阁潮中，张居正处境颇为尴尬，左右为难，他帮哪一个都不是。然而他毕竟度过了，总算没有得罪老师，也没有得罪朋友。不过，经过这次阁潮，使他对言官们的嚣张有了清醒的认识，认为“士习人情，渐落晚来窠臼”，开始考虑如何来抑制日益激昂起来的言官们的声势和气焰。

高拱与郭朴离任后，内阁里除了徐阶和张居正之外，只有李春芳、陈以勤，本来不至于发生什么大的波浪。但是始料未及的政治波浪从皇宫向内阁涌来。徐阶太认真了，他对穆宗爱玩好游幸的积习应当是有数的，可是他偏偏一再谏阻，要穆宗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这引起穆宗本人及其左右的极大不快。隆庆二年（1568）七月给事中张齐又伺机参了他一本。徐阶被迫御任，舍弃了北京的政治生活，回到江南故乡。临行的时候，他将朝廷大事和个人家事，一切都托付给张居正。朝廷大事，居正理所当然应当承担起来；个人的家事，不是指别的，主要是指徐阶的三个儿子。在徐阶当朝的时候，他们横行乡里，擅作威福，且迷恋钱财，名声很坏，民怨极大。徐阶知道自己御任了，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所以吩咐居正，也惟有居正可以替他担当这些事。徐阶的失败完全由于“中人内构”，也就是来自穆宗身边内监的攻击。穆宗是个宽厚但又平庸的皇帝，自己不能亲政，和士大夫之间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联系，一切的耳目，寄在内监身上，政治上的波澜，都从宫中卷起。这一点同样给居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言官之外，内监的力量绝对不可忽视。

正是借助这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高拱再度入阁，同时兼任吏部尚书，这是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的事。从此内阁和吏部的大权集中到高拱的手中，使他成为事实上的宰辅，虽然名义上首辅依然是李春芳。此时内阁中唯一可以与之对抗的是赵贞吉，他热心报国，但个性倔强，在高拱复出之前数月入阁，左都御史王廷致仕后兼掌都察院。他们一个掌握着行政权，一个把持着监察权，相与对峙，旗鼓相当。在这种内阁大势中，首辅李春芳、陈以勤只是旁观，居正则与高拱比较接近。他厌恶赵氏的专横，常常冷眼相待，所以对高拱的复出，抱有一定的期待，他曾经说过：“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有可为。”但随着高拱势力的逐渐膨胀，居正日益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特别是陈以勤和赵贞吉相继从内阁的混斗中退出之后。

从隆庆四年（1570）开始，高拱的势力臻于极盛。他借考察科道的名义，将自己的政敌一概斥逐。据统计，这次考察，共贬斥 27 人，包括御史王圻，曾为给事中已迁大理少卿的魏时亮，曾为御史已迁大理寺右丞的耿定向，以及曾为给事中已迁广东巡抚右佥都御史的吴时来。高拱上次去职，败在言官手里，现在他手下有的是言官，谁不买帐，就给谁一次弹劾。所有这些，居正都看在眼里，他已经没有高拱复出之初时那种期待心情了，慢慢地有些“去留不能自必”了。吴时来是徐阶的门生，耿定向是自己的朋友，他们都被驱逐了，居正深感不安！

张居正的处境越来越难堪了。内阁的大权已完全落高拱之手，言官们又都听从他的指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或遭灭顶之灾。对张居正来说，每走一步都需要最大的谨慎，一步走错不得，一句说错不得。相比之下，高拱则气势正盛，春风得意，炙手可热，咄咄逼人，尤其是他那种有仇必报的气度更让人怵目惊心。你看他对言官们的报复，那么痛快淋漓。现在又要对他从前的政敌徐阶下手了，他早就想对徐阶报复，但都被首辅李春芳拦住了，因此他决定挤走李春芳，并很快达到了目的，当上了首辅兼吏部尚书。张居正明白，在这种时候，谁也无法阻止高拱的报复意图与行动。对此，徐

阶本人也非常清楚，他太了解高拱其人了，所以在他复出的时候，徐阶就感到“心寒”，他知道高拱绝对不会放过自己，但还是寄希望于张居正。

隆庆五年（1571），事态更加严重了。这年，徐阶生日，张居正去信。信中他用“不敢走介，畏行多露”和“鄙怀种种，亦噤不敢言，临楮惆怅而已”等语抒发了自己在高拱威势之下的尴尬处境和无奈之情。徐阶是他的老师，居正何尝不想帮助徐家摆脱困境，度过难关，何尝不想报答老师的接引与提携之恩！但他毫无办法。徐阶的三个作恶多端的儿子被抓了，徐家的田产也被籍没，其中两个儿子被处以充军的大罪，惊恐不安之中的徐阶害怕自己会得到和严嵩一样的结局。在这严重的局势下，张居正还是给予苦心调护。他虽不愿也不敢得罪高拱，但是他仍要保护徐阶。在两难夹缝中的张居正尽管一路提心吊胆，“畏行多露”，但是他在徐阶家事问题上的态度无疑引起高拱及其手下干将的不满，他们很快把目光转移到张居正的身上。尤其是刚入阁不久的殷士儋被高拱驱逐之后，内阁中仅剩下高拱与张居正二人。不过，二者的地位完全不同，高拱接连驱逐了陈、赵、李、殷四位阁老，气概正是逐日发扬。张居正单凭那套谨慎小心的作风，还是时时感到不安于位。对于同样具有很大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张居正当然不会安于这种现状，只是时机未到，也就只能动心忍性了。

三、高、冯交恶及张的得利

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本来不错，他们在国子监同过事，彼此非常了解，也知道日后在政治界中应有的地位。后来，又一直在内阁中相处，最初他们基本上还能和平共处，高拱复出的时候，张居正的态度也是比较友善的。但是，现在他们的地位太逼近了。逼近就是一种威胁，高拱固然感到了这种威胁，张居正更是时时感到危险。这样的局面是在经历了种种风浪之后形成的，但又注定无法维持多久，他们的平衡太微妙了。他们都太强了，张居正当然不甘心于被压抑的地位，高拱更不会把自己已经取得的优势让出来，与张居正分享。于是，“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合内阁的标语。首先是高拱的一批心腹向张居正发难，他们认为张居正帮助一个在野的首辅徐阶，其中必有缘故，因而竭力搜求证据，把发明当作发现，向高拱汇报说，张居正之所以替徐阶苦心调护，原因在于张居正收受了徐阶儿子 3 万两银子。不久，高拱在大学士的朝房里看见张居正时，便半真半假地讥刺了一顿。这给张居正以很大的刺激，张顿时脸色都变了，他指天誓日地否认此事。经过张居正一番剖白，高拱承认是误会，事情才勉强结束。张居正咽不下这口恶气，他感觉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处在高拱的监视之下，他想反击，据说给事中曹上疏劾高拱十不忠，就是他指使的，只是他对斗争没有把握，因此只得静待时机，他的心绪从烦闷转为恬淡。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居正静待的时机会如此迅速到来。隆庆六年（1572）五月中，穆宗驾崩了。高拱、张居正和不久前入阁的高仪同受顾命，辅助年仅 10 岁的神宗，高拱感到自己的责任更重大了。恰在此时，政治上跃起了一个新兴的势力，这就是冯保。他在明世宗时就是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年间，司礼掌印太监出缺，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可高拱却把这个位子推荐给陈洪。以后陈洪又出缺了，高拱硬是不给冯保面子，把这个位子又推荐给孟冲。冯保屡次想升掌印太监的梦想，在高拱的反对下屡屡破灭，冯保因此与高拱结下了不共戴天的大仇。穆宗去世以后，他经过多方精密策划，取得皇后、皇贵妃的支持，驱逐了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得了掌印太监之位，

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冯保为杜塞天下之口，使自己的夺权合法化，篡改了穆宗遗诏，把自己实现了的意图作为一项任命写入穆宗遗诏之中，颁行天下。冯保的崛起，引起了高拱的极度不满，他无法容忍除自己之外的任何政治势力，发誓要赶走冯保，于是在穆宗去世之后政治上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的决斗，也就是高拱与冯保的决斗。

在这场政敌之间的决斗中，双方各有后盾。冯保的后盾是皇后、皇贵妃，尤其是皇贵妃，神宗只有 10 岁，当然和母亲站在一起。高拱的后盾十分强大，包括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还有内阁，舆论和群众。他是一名政治界的老斗士了。他战胜过好几位阁老，经历过大风大浪，又是首辅，位列顾命诸臣之首，因此，从心底里看不上新进的掌印太监。从阵营上看，高拱显然比冯保更胜一筹，但冯保也有自己的优势，他甚至不惜使用阴贼险狠的手段在皇后、皇贵妃面前不断煽惑对高拱的恶感，同时又把高拱在穆宗驾崩当天说的那句话——“ 10 岁的孩子，怎么做皇帝啊！ ”——添油加醋改造一番，讲给皇后、皇贵妃及神宗听，使她们勃然变色，然后站在他一边共同对付高拱。高拱太轻敌了，他只顾忙于指挥手下的言官们上疏，集矢于冯保。他以为奏疏一上去，按惯例皇上就会发交内阁拟旨，而内阁权柄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愁打不倒专横跋扈的冯保。他自己也上疏，请求司礼监掌理章奏的大权，交还内阁。结果很快决出分晓，冯保与皇后、皇贵妃及少年皇帝联合起来驱逐了高拱，冯保胜利了。但这次政变的最大收获者不是冯保，而是高拱的另一个政敌张居正。高拱去职后，内阁中的资望没有人比得上张居正，因此他便循序坐上了首辅之位。不久，高仪病故，张居正便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他的地位益加巩固。

对于这次政变，高拱一直耿耿于怀。他不相信自己会败在冯保一人之手，心想如果不是张、冯合谋，单凭冯保之力怎么可能把自己逐出朝廷呢？冯保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可能矫诏？又怎么可能写出宣布自己罪状的谕旨呢？肯定是张居正在暗中策划，由冯保付诸实施。这是一种合理的猜度，高拱在临死时把这种合理猜度写进了《病榻遗言》，并把自己所有的屈辱、愤怒和怨恨发泄出来，指责张居正与冯保对自己的无端构陷。高拱的指责是可以理解的，高与张、冯之间的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然而，他对张居正的丑诋却不是实事求是的，带有明显的个人恩怨色彩。

事实上，在高与冯的决斗过程中，张居正并没有参加冯保一边，他所取的方式是坐观成败：假如高拱胜利了，张居正自然还有他的“ 义命之学 ”，静待时机；假如冯保胜利了，那么收拾朝局，非己莫属，而且对于冯保，他也自信还有对付的本领。出于这样的成算，张居正对高与冯的决斗基本不予介入，要么称病不出，要么就是奉诏到大峪岭视察穆宗的葬地，能回避则回避。他当然不想在高拱傲视之下生活，希望高拱失败，以完成自己掌握政权的目标，但并没有与冯保一道陷害高拱。高拱去职后，居正也不愿把事做绝，曾在皇后、皇贵妃面前“ 冒死为之营诉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出京公干，来回路过新郑都去看望高拱。高拱死后，张居正也多次流露了对他的思念、哀悼之情。这种感情是很难讳饰的，它说明张居正始终没有仇视高拱。但从高拱角度讲，情况就不同了，他是个失败者，而张居正却坐上原来自己的首辅之位，因此横生猜疑，是非常自然的。

四、遗言造成了一部痛史

高拱临终所撰《病榻遗言》的情节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一时难以判断，

姑且不论。但在当时确有许多人坚信高拱所述真实不虚，许多证据十分可靠。它的刊刻问世在朝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明神宗下决心彻底解决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

张居正案发生于高拱死后不久，是从明神宗颁发的一道诏书开始的。在这道诏书中，神宗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虚增面积，或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神宗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休养生息的机会。神宗的这道诏书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立即激起巨大的波澜。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一概被指斥为佞官；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反张的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一道道弹劾张居正的奏疏如雪片般向神宗飞来，而且措辞一道比一道更激烈。他们指出，大批负责丈量土地的地方官劣迹多端，胆大妄为，显然是因为得到张居正的支持。这一运动慢慢地、但是有进无退地蔓延开去，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了 1582 年底，距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犯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罪名，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

这一切使张居正在神宗心目中的形象顿然改变，神宗感觉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张居正的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以圣贤自居，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就连身居九五之尊的神宗也望尘莫及。当然，神宗对居正的这种印象最主要的是来自劾张的奏疏。

明神宗是个优柔寡断的君主，但他对张居正态度的转变，却大大激励了反张运动，那些曾经受过张居正压制或迫害的臣僚和不怀好意的廷臣决定彻底清算张居正。短短几个月，几乎所有因触犯张居正而得罪的官员一律得到起复，降为庶民的复职，充军边地的召回。至于这些人所受的处分是否咎由应得，则不在考虑之列。但是，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就是东厂提督、司礼监太监冯保，他是张居正的政治伙伴，在张死后依然掌握重权，“ 肆横如故 ”。于是曾经受过冯保排挤的太监张鲸和张诚二人伺机出头检举冯保的罪恶，请求神宗将他的罪状公布于天下，并藉没他的家产。对于神宗来说，这种请求无疑正中下怀，只是慑于冯保的骄横，不敢轻易下手。他颇为犹豫地说：“ 若大伴（指冯保）上殿来，朕奈何？ ”张鲸等立即回答：“ 既有旨，（冯保）安敢复入！ ”于是依计而行，神宗下诏以“ 欺君蠹国 ”之罪将冯保发往南京闲住，同时将其弟侄冯佑等削职为民。在查抄冯保家产的时候，神宗大为吃惊，一个太监竟然拥有金银百万、珠宝珍异无数！他开始领略抄家的滋味。由此他非常自然地想到张居正的财产，因为他比冯保的罪恶更大而且更富。但一提起张居正，各种复杂的记忆就会在他心头涌集。所以，在冯保被摈弃后，有一位御史继续上本参劾张居正 14 大罪，神宗用朱批回答说，张居正蔽主殃民，殊负恩眷，但是“ 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故贷不究，以全始终 ”。作为一种回应，神宗下诏剥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文忠公诸赠谥，并褫革了居正诸子的官职。神宗本想适可而止，就此了结张居正案。

神宗的这种处理决定，自然不会使反张的臣僚感到心满意足。他们继续揭发，上纲上线。御史羊可立旧事重提，追论居正构陷辽庶人宪。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辽王府次妃王氏乘机上疏鸣冤，控诉张居正生前出于个人恩怨，攘夺府邸而蒙蔽圣聪，废黜辽王。更严重的揭发还在继续，甚至说居正生前有谋反篡位的野心，总兵戚继光的精锐部队是其企图发动政变的后盾。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深深刺痛了神宗。恰在此时，神宗读到了高拱的《病榻遗言》，心肠不由陡然变硬，并于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下令藉没居正的家产。当时在朝的大臣如左都御史赵锦、吏部尚书杨巍等人对神宗的决定都感到太过分了，因而上疏予以劝阻，但此时的神宗再也听不进对张居正的任何好论了。

于是，由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橓及锦衣卫、给事中等组成的抄家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了。他们到江陵之后，搜出了张居正兄弟及诸子的全部私藏，一共得到黄金万余两，白银 10 余万两。这一数字与他们预期的相距太远，当然不会满意。于是，邱橓一伙对张居正诸子严刑拷打，要张家招出寄存宅外的 200 万银两。居正长子敬修不堪非刑，悬梁自缢，次子懋修自杀未遂。几天之后，张家的一个仆人也继而自杀。

敬修的死，惊动了朝廷，申时行和六部大臣疏请从宽处分。刑部尚书潘季驯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乃起而上疏说：“ 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 ”在这种空气之下，神宗才下诏特留空宅一所，田 10 顷，赡养居正的母亲。但张居正的家属张居易、张嗣修、张书、张顺还是被充军岭南烟瘴之地。同情张氏家难的申时行遭到神宗温和的申诫，潘季驯则被削职为民。

居正临终的时候，神宗曾对他说：“ 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 ”两年后，神宗就以抄家、毒打、充军的方式看顾居正的子孙，真是令人鼻酸。虽然，触发神宗对张居正下此绝情辣手的原因很大，但很大程度上与高拱临终所撰的《病榻遗言》有关，这是神宗下决心彻底解决张居正案的一个重要依据。从这个角度上说，高拱在临死时仍狠狠“ 咬 ”了张居正一口，从而借助神宗的力量实现了报复张居正的目的。他们之间的恩怨终于随着张氏家难的落幕作了一个了结，但却留下了一部异常惨酷的痛史。

更为严重的是明神宗还因人废事，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破坏。在处理张居正案的同一过程中，张居正生前推行的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社会改革措施，如整顿吏治、整伤边防、整顿学校、开源节流、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等等，也大多被明神宗取消了。从此，神宗长期怠政，不理朝政，不见群臣，甚至连“ 庙礼皆遣代 ”，“ 太庙亦不亲祭矣 ”！明朝的政治因此而一天天败坏下去，社会矛盾因此而一天天潜滋暗长，并日益尖锐、恶化。关于这一点，早就有人慨乎言之，“ 明之亡，亡于神宗 ”。而这一切，又都是从神宗处理张居正案和废止张居正变法开始的。

“ 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贝多芬最后的“ 哀乐 ”

一个伟大的生命终于离开了人世。

1827 年 3 月 26 日，维也纳初春的傍晚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在夜幕将临时分，天上落下纷飞的大雪，间或还伴有早春的雷鸣。这一天是

著名音乐家贝多芬的祭日，上述情景就是那天不凡的气象。

一、死，还是不死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57 岁的年纪上辞世，而他撰写遗嘱的时日则更早，那时才 32 岁，是在 1802 年 10 月。

正值年轻的岁月，风华正茂的时节；然而，伟大的贝多芬命运多舛，当生活刚刚崭露青春的色彩时，贝多芬却不得不感受悲惨的——实在是够悲惨的——生活。他从 1798 年听觉开始衰退起，悲惨的感觉也日渐加深，当别人听到远处的笛声而自己听不到时，当别人听见牧童的歌唱而自己一无所闻时，贝多芬感到莫大的屈辱；他生就一副热烈与好动的性格，此时不得不因听觉的衰退而避开大众，过着孤独的生活；那种在微妙的谈话中，在彼此的倾吐中获得的愉悦、慰藉，与贝多芬无缘了。他不得不面对悲惨的生活现实，那从前比音乐界谁都完满、比普通人谁都优胜的听觉感官残废了。

久治不愈的病使贝多芬的心惨痛欲裂，他不得不逃离人群，住到乡间，过着亡命者般的生活。正是这亡命者般的感受，又使得贝多芬把尘世看破了，对生活绝望了，于是他想到了死，想到了在死之前留下个遗嘱。

遗嘱里不乏辞世之际的凄婉：

“噢，你们这般人，把我当作或使人把我看做、心怀怨恨的、疯狂的，或愤世嫉俗的，他们真是诬蔑了我！你们不知道在那些外表之下的隐秘的理由！”

遗嘱里不乏悲凉的绝望：

“总之我已准备好了。28 岁上，我已不得不看破一切，这不是容易的；要保持这种态度，在一个艺术家比别人更难。”

遗嘱里更有亲近死神的坚决：

“死亡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罢，我将勇敢地迎接你。”

贝多芬准备赴死了。1802 年 10 月，在维也纳郊外的埃林耶希太脱，怀着耳聋的巨大悲伤与绝望，他开始写下给他的兄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

遗嘱是因为死而写的，贝多芬在其中写了生前的遗愿、遗恨，写了自己微薄财产的分割处理，写了对亲人朋友的祝福与感谢。写了“从无穷的痛苦之中解放出来的死的愿望。

然而，贝多芬对死亡的亲近遭到了生命意志的强烈搏击！他书写死亡的愿望时，字面上跳出生存的理由；他走向黄泉黑道时，面对了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悲壮地为赴死而慷慨疾书时，贝多芬突然在遗嘱中写出了一段从天而降的不死的理由、活下去的原因：

“是艺术，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已经有了耐性。但愿我抵抗的决心长久坚持，直到无情的死神来割断我的生命线的时候。”

在死亡面前，贝多芬的生命因艺术而绝处缝生了！走向死亡的惨淡生命在奇迹般超越死亡后又开始了无比辉煌的新生。遗嘱成为贝多芬新生的起点，成为天才般创作的开或许，让贝多芬丧失听力是出于天神的故意，好让他避开尘世的嚣张，全身心地沉浸到天才的幻想中。无论如何，丧失听觉的贝多芬在音乐创作上比以前更加出神入化，是无法漠视的真实。

二、“有朝一日，他将震撼世界”

贝多芬身处英雄与天才风云际会的时代。他早年曾被英雄赏识，那时，他还很小，只　16 岁，便冒然闯入“音乐之都”——维也纳去拜谒莫扎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